

ZHONGGUOGUD

AIZHIXUEMINGZHUQUANYICONGSHU

子非韩全译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

译丛书

●建国以来首次集中了儒、释、道三家精华的译文

陈明 王青 译注

全

(上册)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陈明 王青·译注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韩非子全译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非子全译/ 陈明, 王青译注. 一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8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ISBN 978-7-80752-158-7

I. 韩… II. ①陈…②王… III. ①法家②韩非子—译文
IV. B226.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248 号

韩非子全译 (上)

陈明 王青 译注

责任编辑	周田青 童际鹏
封面设计	张光明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总 印 张	30 (本册印张 15.5)
字 数	38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158-7
定 价	65.00 元 (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总 序

任继愈

在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统一方针指导下，我们与巴蜀书社合作，编辑了这套《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世界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它对人类文明已经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伟大的贡献，有赖于民族思想文化的成熟。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忧患和灾难。但是，忧患和灾难并未使它消沉，反而使它磨炼得更加坚强，在与困难和挫折的斗争中，它发展了、前进了。在前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认识着世界，改造着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身。

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其深阔的内容，明睿的智慧，在古代社会，和其他民族相比，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中国哲学，在当时，无

愧于自己的时代；在今天，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随着对历史的深入剖析，中国哲学的内容和它的价值，将日益被更广大的人群所认识、所接受。

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有责任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是要创造新的物质文明和新的精神文明，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求借鉴，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是个必要的途径。

借鉴中国古代哲学，广大读者首先遇到的麻烦，是语言文字的障碍。本丛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扫除这个障碍，使得更多的人能从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中得到启迪，锤炼他们的智慧。

汲取前人的文化财富（包括哲学、文学、科学、艺术），都应该直接取自原作，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事实上，能做到这一点的，总是少数人。所以从古到今，都有一些人在从事翻译工作。有不同文字的互译，也有古籍今译。缺少这个工作，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就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的财富。

古文今译，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曾把商周的文献典籍译成当时流行的语言，树立了成功的范例，使诘屈聱牙的古代文献，被后世更多的读者所理解。古希腊哲学为后世欧洲哲学的源头，今天的欧洲人（包括今天的雅典人）了解古希腊哲学，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古希腊文原著，人们多是通过各自民族的现代译文去了解古希腊哲学，这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任何译作（古文今译，异国语文互译）都难做到毫不走样。但我们要求本丛书的译文除了对原文忠实外，还要尽力保持原著的神韵风格。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并希望以此和广大读者共勉。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凡 例

一、本丛书是高层次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全译丛书。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译本即可直接承继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使国外读者可直接依据今译本译成外文，以利中外文化交流。

二、本丛书可供研究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以适应中国文化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需要。

三、本丛书选取中国古代著名的较为难读、又较为完整的哲学论著分批进行今译。第一批选题二十四种。

四、本丛书第一译本均吸收古今各家成果，忠于原著精神，突出哲学思想。

五、本丛书第一译本均分为译文、原文两部分，译文用现代简化字，原文用繁体字。

译文前均有一篇较长的研究性述评，文中各篇多有题解。

译文部分附必要的注释，原文部分附必要的校勘。

六、今译是本丛书的主体部分，译文尽量做到信、达、雅，

要准确信实地译出原意，要用精确、流畅、规范的现代汉语表达出原著的哲学思想，力求体现原著风格韵味。不拘于直译、硬译。

七、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一般在译文确实无法传达原著思想，或古代语辞确实无法译成现代汉语时加注释。

注释在充分领会前人成果基础上，断以己意，力求简明扼要，避免繁琐罗列。但有价值的不同意见，必须列出。

注释一般用脚注。

八、校勘体例仿照《二十四史》校点本。本丛书每一种书所依据的底本，尽量选用业经整理的较好版本。

九、本丛书每一译本一般附以哲学范畴、命题索引和参考书目索引。根据具体情况，或设或不设人名、书名索引。

哲学范畴、命题索引以原文为主。

物合其性，……

油然其且而游定陆陆乎 **前 言**

。前之出也。然其内命主德而得必言其内主德也。

，按卒而难商，随朝朝战吴，对悲成对暗献平而主之革而改。

。既富国而强兵，起而为战，既而，斗上科望然而前。

了也。彼者得而自求不求而得，平公室宗而国特是也。

重退宰子公室而主朝，外居于魏王主夏风，对朝而主尊威。

宗坐则平，出而求治也，恒之文且亦成国朝，文胜国乘也。

对朝 **韩非死于秦王政十四年（前 233）**。生年现在一般有两种说法，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说他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前 280），理由是他与李斯同为荀子学生，年岁应与李斯相当。另一种说法是说他生于韩釐王初年（前 295），这是根据《韩非子·问田》中堂谿公与韩非谈论的记载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堂谿公与韩昭侯对答的记载推断出来的^[1]。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子是韩国公子，为人口吃，不善言谈，见韩国之削弱，多次上书韩王陈述政见，均不为采用。发愤著书十余万字，传到秦国，秦始皇大为嗟叹，想与作者同游，因急攻韩国^[2]。韩非出使秦国，即被秦国扣留，因李斯、姚贾进谗言而下狱，随后被杀。从《韩非子》中的言论来看，韩非毕生都在建立和宣传自

己的法治理论，力图在当时的诸侯各国尤其是在韩国实行法治。与其他法家代表人物一样，韩非为了推行新法也表现出不惜献身的勇气。他明知变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为“不可两存之仇”（《孤愤》），实行法治肯定会得罪当权大臣，而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同上）与“乘五胜之资”（同上）的当权大臣争斗，“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同上）。况且君主对法术理论的需要远不如对珍宝玩好的需要急切，卞和进献宝物尚且被砍断双腿，法术之士对君主的进言必将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他之前，变法改革之士的下场都极为悲惨，吴起被肢解、商鞅遭车裂，但他仍然坚持上书，强烈鼓吹变法，希望祖国富强。

他是韩国的宗室公子，但他并不为自己的私利着想。为了加强君主的地位，他反复主张强干弱枝，防止侧室公子掌握重权。当秦国进攻，韩国危在旦夕之时，他挺身而出，不顾生命危险，毅然赴秦，并施展其才辩智巧，劝说秦王攻赵，以解救韩国，最终死于敌手。应该说，从个人品行上看，韩非是值得尊敬的。可是，韩非本人在历史上一向得不到高度的评价，这大概和他天资刻薄的性格和惨礲少恩的理论有关；然而，韩非这种极端专制而又残酷的治国理论乃是时代和地域的产物。

二

韩非生活的时代，是战国的末年，此时秦国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余六国。在韩非死后的第12年，秦国就统一了全国。而韩非的祖国韩国是六国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国家。由于韩国的地理位置介于大国之间，秦要进攻六国，统一天下，韩国

首当其冲；六国要合纵攻秦，韩又成为战场。终韩非一生，韩国一直处于强邻侵袭、国土日削的危难中，仅靠臣服于强秦，“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存韩》），入贡尽职如同秦国郡县无异，才得以苟延残喘。所以“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同上）。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内政却依旧黑暗昏乱，法制不立，赏罚不明，任人唯亲，大臣结私党、拉帮派，民众弃耕战、务末业。韩军之弱小，天下闻名，所以李斯要说：“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同上）因此，韩非一心谋求的，首先是富国强兵，使韩国能不依靠大国而自存。

然而，韩国灭亡的危险并不仅仅来自于强邻。春秋战国之时，君主之位被异姓权臣篡夺的事例数见不鲜，较为著名的就有田常篡齐、三家分晋、子哙让国等等；而君主被劫杀的更是比比皆是，如春秋时楚国王子围绞杀楚王、齐国崔杼弑君，战国时的李兑杀赵主父、卓齿杀齐湣王等。因此，如何实行君主专制，防止权臣篡位，也是韩非极为注意的一个问题。

早在韩非之前，前期法家就围绕如何富国强兵、加强君主专制，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有些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对韩非影响最大的当数慎到的“势”论、申不害的“术”论和商鞅的法治思想。尤其是商鞅的法治理论在秦国实行之后，秦国国富兵强，在六国中异军突起，成为实力最强的霸主。然而，这三种理论，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各自的缺陷。申不害的理论是在韩国实行的，韩非对其弊端看得最为清楚。那时的韩国承袭故晋的传统，在改革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法令不统一的现象，“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定法》）。所以韩非认为申不

害的改革“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同上），变法并不彻底，因而未能达成霸王之业。而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出现了许多权倾人主的大臣，前有穰侯魏冉、华阳君羝戎，后有吕不韦。所以韩非认为商鞅的缺陷在于“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同上）。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韩非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政治主张。所谓“法”，就是成文法，“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所谓“术”，乃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同上）；所谓“势”，就是势位，主要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因情》）。法是公布出来要人民遵守的，而术只由君主秘密掌握以保证法的贯彻，而势乃是贯彻法、术的先决条件。这三者的密切结合，就成为富国强兵、巩固君主专权统治的手段。

更具体地说，法治的关键在于执法，执法的关键在于赏罚的分明。韩非的法治理论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之上。“夫买庸而播种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耨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说三》）做车子的匠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匠人希望人早死，并非他们对人有爱憎之分，而是为了售卖车子和棺材以求取利益（《备内》）。类似这样的互利关系不只存在于雇主与雇工、卖主与顾客之间，它也是人际交往的普遍原则，连父子关系也不能例外。“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

枉，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六反》）父母与子女尚且如此，君臣之间就更不用说：“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因此，韩非一再强调君主不要指望臣下民众能爱自己，而要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服务。如何才能使臣民不得不为君主服务呢？韩非认为人的本能都是趋利避害的，由于人性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赏罚乃是鼓励和禁绝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两种权柄。奖赏的方式无非是进爵升官，进爵升官必须以功业能力而不是以名声、私情或者善辩作为标准，这样才能进忠退奸，使民众致力于军功和农耕。罚的主要手段是刑诛，一方面威胁奸臣的不轨，一方面防止民众的叛乱。术的主要用处在于察奸，主要方法是“众端参观”、“一听贵下”，即用参验的方法，掌握真实情况，防止偏听偏信。其次还有“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手段，即下假命令、说假话、设置圈套，以诱惑获得真情等纯粹玩弄权术的阴谋诡计。势是需要独掌的，独掌权势的关键在于强干弱枝，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巩固公庭，削弱私门，才能使大臣不能威胁君主的权位。综上所述，韩非理论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

韩非的理论同样也是地域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各家学派，固然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同时也与各家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关。任继愈先生等认为，当时分别产生了四种文化类型，即以儒家为代表的邹鲁文化，以《楚辞》、老庄哲学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法家为代表、兼产纵横家与名家的三晋文化，以管仲学派（法礼结合）、稷下学派

(以道家为主)、阴阳方术为代表的燕齐文化。三晋指韩、赵、魏三国，处于四战之地，地理条件不如邻近大国，缺少天然屏障和回旋余地，为了在激烈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国家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交往的利弊，利用矛盾，争取外援。所以著名的法家人物如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都是出生于这一地区^[3]。因此，韩非的理论乃是三晋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政治军事形势下的产物，也是这一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产物。

与当时的其他理论如儒、墨、道相比，法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奖励耕战，开阡陌封疆，打破井田制，垦殖新的土地，鼓励小农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它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并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客观上有利于打破旧贵族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起到了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今天看来，《韩非子》的历史价值在于适应了历史的大趋势，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战国时期，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各家各派围绕如何实行统一，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与主张。墨子以“尚同”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孟子主张以“王道”统一，老庄则认为“无为”、少干涉的统治才是实现统一的最佳途径。实践表明，只有法家理论才使中国真正走向了统一。这是因为，统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强大的集中政权是办不到的，而韩非学说恰恰提供了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的一系列方法。韩非的法治思想没能在韩国实行，却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根据。

秦朝很快覆亡，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乃是秦朝统治全国的经验不足，用秦国的局部经验来处理全国统一后的复杂局势。因此，秦朝二世的灭亡并不说明法家思想的全盘失败，相反，法家思想的精髓被以后历代统治者继承下来，依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产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讲“刑名”之学，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儒家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然而，此一时期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法家化”之后的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不但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其君臣观念也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1〕}。唯其如此，儒家才能被统治者真正接受。自此以后，封建地主阶级一直采取的就是“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思想^{〔2〕}，韩非“法不阿贵”的执法严明的精神，和“循名责实”、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以及他的历史进化观点，都为后来封建社会中进步的政治家所推重，用做励精图治、变法革新的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可以说，韩非乃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3〕}。然而，韩非在中国封建社会也颇受非议。这是因为韩非鼓吹赤裸裸的暴力统治，他所主张的“连坐”^{〔4〕}、“告奸”^{〔5〕}等统治人民的手段，驾驭臣下的一系列权术，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阴谋的基础之上的。他摒弃儒家的仁义，不讲伦理道德的价值，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不利于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伦理秩序。他那种摧残智性、压制知识分子的极端反智论倾向，容易引发封建士大夫的不满。随着封建纲常的强化以及儒家独尊地位的加强，韩非的理论逐渐成为异端且遭受

自己的欲望和成见，使臣下无法探测君主的暗意，从而杜绝臣下窥窃君权的念头。《告子篇》：“告子曰：‘尽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游氏对韩非较为明确地提出“理”下的范畴；他所说的《〈理〉》也具有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的意义。如果说“道”是普遍规律的话，那么“理”就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故定理有存在，也有死亡，有生有盛衰。万物之中存者亡其生，死生、初盛而度衰者，无不谓常。《吕解老》：“非‘道’，是永恒的道而出‘理’是相对的，以有生有盛衰的过程。事物都有其存在之理，不理是事物之间区别的根据。由于事物之间有不同性质和规律，因而有。规定界限域而不相混，所以他说：‘凡理者，或方圆，或短长，或粗靡，或坚脆，或分也，或理定而后可得道也。然则何生于理定而后可得道？说明普遍性的道寓于特殊性的理中。具体的方圆、长短、粗细、坚脆等属性也是道的体现，这样由特殊到一般，就部分地撕破了‘道’的神秘面纱，‘道’也是可以捉摸可以把握的。掌握了‘理’，亦即事物的具体规律，就可识别和把握对象了。《用物》是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厌谿之？有圆形，古则有短长，或有短长，时则有大小；有小大，时则有方圆；小有方圆，刚则有坚脆；有坚脆，武则有轻重；有轻重，刚则有白黑。《短长》：犬小则方圆，而坚脆、轻重、白黑是谓理。《同上》据此他提出要依据事物普遍和具体的规律行事，《表里》：“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量才能成关系之势尊，从小易得卿相将宰之赏禄”（《同上》）。“类之言言”就是在认识论上，韩非认为获取知识的源泉在于客观世界，而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必须依靠人的生理器官。他反对主观妄动，“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同上》）。韩非非

常看重经验在获取和检验知识中的作用。他坚决反对先验论，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解老》）所谓“前识”，即不通过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获得认识的主观臆想。对于知识的检验，必须采用“参验”的方法，要用实践效果来验证。从这种认识论出发，韩非强调对下属的评定应该注重其功绩，而非看重其言谈。以功课实，铭实相副，才能予以信从。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论，韩非极力反对鬼神占卜和星象迷信：“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参不足以专战，然而持之，愚莫大焉。”（《饰邪》）秦国君迷信鬼神注重祭祀事乃是国家灭亡的征象，他说：“用时日筮事鬼神，信卜筮而妖祭祀者，国之害也。”（《安危》）韩非的无神论思想较之于先秦各家都更为激烈，这乃是他思想中最具光彩的内容之一。同时，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他的历史观是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强调事物中充满着矛盾，书中两次提到矛和盾无法统合的故事，但也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对立面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如他说：“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安危》）“医刀刺骨，可以除病；忠言逆耳，可以获福。”说明对立面是相反相成的。他看到事物具有质和量的对立统一，事物的发展有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喻老》）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总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难到易，是不断前进的运动。而“尊使士封爵于天下，是皆由举妄而置贤夫。”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五蠹》中，他将人